

走过青春

村里养骡脱贫的故事

杨玉青 刘永静

“我的第二故乡”——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



● 再上洛川塬



● 重坐热炕头



● 与老农叙旧



● 烂柯山上合个影

放眼李渠公社，有骡子有马的村屈指可数，大概只有靠近公路的队才有。他们使骡驾马赶大车跑运输。我们插队的沟门，从前村到后村，去邻村上镇里，只有架子车通过的崎岖小路，无大车可拉。可队里偏偏就养了一头骡子。

饲养员是个老汉，叫马有富。在养骡子的同时还喂着三头驴。村里人都叫他“喂驴老汉”。马老汉单身，五十几岁，患有柳拐病，干不了重活儿。就在牲口棚对面的小土窑里住，守着生产队的几头牲口精心喂养。

这匹骡子是马骡，骨架大，让马老汉伺候得膘肥体壮。它长着浅驼色的毛，脑门前扎了一缕红缨子，走起路来昂头挺胸，蹄声清脆，长尾巴一甩一甩的，继承了马的英气俊朗，又多了几分驴的聪明和倔强。

每天晚饭后，喂驴老汉牵着骡子在村前庄后溜达。人们看见他，免不了调侃：“又拉着你家状元郎游街啊！”

“噢，眼热啦？”搭话间，老汉不由挺了挺腰杆，就喜欢听别人夸他的骡子。

有一天，喂驴老汉拉着骡子正准备去遛弯儿，一个男知青碰到了，想骑上试试。老汉说这骡子生分，是个“愣怂”，骑不得。但怎么拒绝也不成。可能也看在知青执拗的份上，就罢了。他把骡子牵到低处，紧紧攥着缰绳，让男生就着高坡，没费力骑上去了。骡子乖乖地走了几步，没敢想走到平地时，先是头一低，接着抬起双

蹄，身子往后一仰，瞬间把那位男生仰翻在地上，围观的人都惊呆了。好在这“愣怂”没尥蹶子。若是碗口大的蹄子踩在人身上，人非死即残。

骡子挣脱缰绳哒哒地跑了。我们要去找，老汉说这“哈怂”一会儿就会回来。果不其然，话音刚落，由远及近传来哒哒的蹄声。骡子在村口的坡下露出了头。这家伙甩着尾巴，缓缓地走到老汉面前，舔着老汉的手，像是做错事的孩子，慢慢地跟在老汉后面回牲口棚去了。

大骡子威武高大，人见人爱。可派它去转碾拉磨碾米磨面，没毛驴老实，走走停停，婆姨们称它“懒怂”；派它往川地送粪，套上架子车，就像屁股后面着了火，跑一路，颠一路，粪撒了一路。一车粪送到地里只剩下半车，气得汉子骂它“贼怂”。这就货色，却被马老汉护得跟眼珠子似的。因为，它可是队里最值钱的财产，村支书的掌心宝。

搁在平原，这匹骡子肯定是驾辕拉车送货运输的好手，难不成窝在这小山村憋屈一辈子？然而不是这样的。队里决定买下它，自能派上大用场，这也是村干部的远见。

我们沟门在公社里算是地理条件较好的。算上知青，全村54户，耕地1800多亩，其中400亩是平整的川地。虽然如此，但因陕北干旱少雨，土地贫瘠，广种薄收，尽管社员辛勤劳作，却仍然家家贫困，缺衣少粮。为割资本主义的“尾巴”，队里

没收了各家的自留地，闹得社员怨声载道。

山有山路，水有水路。用村支书的话来说，活人哪能让尿憋死。在党支部的带领下，沟门队因地制宜，围着水井搞了水浇地种菜，属于生产队的副业。

蔬菜生长离不开水浇地。抽水浇园的力气活儿骡子就派上了用场。自从上工起，它就被蒙上眼睛，不知疲倦地拉着水车一圈又一圈地转。水被绞车带上来，汩汩流入水槽，又静静淌入田间。20多亩菜地全靠这骡子浇灌，谁见了都夸它是匹“蛮怂”，比驴有劲儿耐力强。

菜园里，春夏秋三季蔬菜应有尽有，既解决了全村上百口子人吃菜问题，又靠卖菜赚了钱。一举两得，办了好事。

就这样，沟门队通过骡子一浇水一种菜一创收这条产业链，挣到了钱，拉上了电，搞起了粮食加工等副业，过上了点灯不用油、磨面不用愁的日子。

在村党支部的谋划下，队里又在打机井、修电站、引进高产农作物上进行了投入，实现了粮食增产，一步步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。

插队四年，我们参与并见证了小山村的变迁与发展。如果问沟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那就是社员的眼界开了，人的精神面貌好了。什么也挡不住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什么时候也别低估老百姓的聪明才智与能力。在这点上，我深有感触。

刻骨铭心的延安情结

孙英伟

离开北京到延安插队，距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，可当年的插队生活依然鲜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，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。

还记得1969年的那个冬天，延安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。我们坐在大卡车上，一路颠簸着来到李渠公社。下车后，队里的老乡早已等候在那里，我们8名女生和3名男生跟着老乡，沿着小路往崖里坪大队走去。由于我们穿的都是塑料底棉鞋，一步一滑，到了上坡时更是往下直出溜。这时也顾不得那么多，几乎是四蹄着地往上爬了。就这样非常狼狈地来到了队里。

当时给我们安排的住处是生产队后边的已经倒闭了的“八一铁厂”那废弃的工人宿舍。孤零零的一排小平房，每间平房都有半间是炕。房顶是通的，各间屋子说话声音大一点都能听到。由于这里多年不住人，又没有烧炕，屋子里冷得就像冰窖。到了晚上，乡亲给我们拿来一盖巴掌大的油壶，壶嘴里有一根棉线，点燃后冒着黑黑的油烟，豆大的火苗忽闪忽闪的。

由于太冷，我们早早地钻进了被窝。父母为我们准备的厚厚的新被褥发挥了作用，暂时为我们驱赶了寒冷。从北京到延安的车马劳顿，让我们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当我们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已经放亮，清冷的房子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已经在千里之外的陕北的“家”中度过了第一个夜晚。直起身子一看才发现，每个人呼吸的热气已经在被头结了一层薄冰，让人更感觉到陕北冬季那彻骨的寒冷。大家互相鼓励着，咬着牙起床了。我们起来洗脸时，才发现桶里的水早已经结成了冰疙瘩，毛巾也冻得硬邦邦的。和两天前北京家里那暖气充足的房间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。

到延安没几天，春节就到了。那几年的延安，家家缺少粮食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我们知青的到来更是给延安带来了极大困难。国家紧急从外省调拨粮食，作为知青第一年的口粮。

除夕，我们看着仅有的几样粮食，没有油，没有菜，毫无生活经验的我们，决定睡懒觉度过那一晚。

第二天早上九点多，我们就听到外面有许多人说话，那声音模模糊糊，也听不清楚在说什么。想想起来也是冷，也懒得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就这样，我们一直赖到十一点才慢慢地爬起来。可当我们推开露着大缝吱吱作响的房门时，门外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，那么多老乡蹲在冰天雪地里，等着我们起床。

老乡们大多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，腰里系着布腰带，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，

两手交互着插在袖子里，鼻头早已冻得通红。

原来，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天，生产队专门召开了会议，讨论怎样让我们这些学生娃娃过年。大家一致认为，就是各家再苦也要让这些北京娃过好年，不想家。

在接下来的三天里，老乡们每家请一名学生到自己家里吃一天过年饭。这样算下来，不见得家家都能轮上。所以就发生了“抢人”到家中吃饭的一幕。

当时我们还来不及反应，已被老乡拉住了胳膊。我们长这么大，从未单独到生人家赴宴，我们三两个知青就互相拉扯着想结伴去同一家。可这时已经由不得我们了，我们一个个硬是被分开拽着往村里走去。小山村顿时活跃了起来，各家的婆姨娃娃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，在自家窑洞前高兴地迎接我们的到来。没有拉到学生的家庭深感遗憾，准备第二天接着“抢人”。

在暖暖的土窑洞中，热腾腾的饭菜摆在炕桌上，有大肉、油糕、米酒、油馍馍、饺子……按照当地的习俗，尊贵的客人要盘腿坐在炕的最里边，老乡热情地邀请我上炕，可我哪会那么长时间地盘腿坐呢？好说歹说坐在了炕沿外边，可以把腿吊着。另外几名知青也和我一样，在各家都是坐在炕沿上，以致之后多年一直成为老乡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在老乡的关爱中，春节很快过去了。严峻的劳动关又来考验我们了。还记得第一天上工的日子，我们早早起来做饭，但是由于掌握不了用大灶烧煤做饭的技术，大家心急，每个人都拿起火钳子去鼓捣鼓捣灶中的煤，结果火越来越弱，大锅里蒸着的一锅发面窝头怎么都不上气。时辰不早了，老乡也都过来等我们了，我们决定窝头不熟也不等了，就这样吃。结果吃到嘴里，外面那层还可以，里边还是生的。因为没有菜，就蘸着盐粒把半生的窝头吃了下去。这时觉得真渴，却没有热水喝。不知谁看到小锅里有刷锅水。我们一看，锅里泡着用过的碗筷，还有高粱苗做的刷锅的刷子，脏兮兮的小半锅水刚刚冒起几个水泡泡，快要开锅了，大家每人盛了一点就喝。

随后，我们跟着老乡开始了第一天的劳动。以前上中学时，每年都下乡劳动，觉得自己挺能吃苦的，但绝不会想到第一天的劳动是那样艰辛。让我深深地领悟了什么是不顾死力，什么是拼命！那天是往山上的田里担粪，每人一条扁担，扁担前后分别挂着个柳条筐子，装上沤好的粪，往山上送。我们从未挑过担子，平时空手爬山都累得气喘吁吁。可现在要挑上几十斤重的东西，还要掌握好平衡，走的又是山路，中途没有平地，

不能停顿片刻。向来要强的我们，挑着担子，用尽全身力气往山上走去。不一会儿，棉袄就被汗水湿透了，冷风吹来，后背冰凉。往上看，连绵的黄土高坡一波连着一波，好像永远没有尽头。我一边艰难地前行，一边在心里默念着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”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，然后咬紧牙关，一步一步往上攀登。

第一趟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了。我放下担子，往山下望去，根本看不到出发点。十几里的山路，挑着担子的我不知是怎样走上来的。老乡耐心地给我们传授走山路经验：不能盯着脚尖，要把脚放平，慢慢使力气往上走。我们也观察到他们一路上全部都是脚掌着地，迈着标准的八字步，轻松地往上走，这绝非是一日之功。

下山的时候，我的腿软得直想往下跪。我深切体会到“上山气短，下山腿软”这句话的含义。那天，每人要担三趟粪。老乡担第三趟时，我们第二趟还没有下山。他们说下去就行了，不要再上来了。不服输的我们拼了命也不能在第一天败下阵来，坚持完成了任务。

我们收工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山村里静悄悄的，大概他们已经歇息了。那天，回到住地，我想喝碗热水，才发现自己的两只手哆嗦得竟然端不起饭碗，只好凑在桌沿边上，弯下身子趴在碗边喝那口热水，好舒服呀！一天下来，我们的肩膀都磨破了，衣服贴上去疼得钻心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，突破了体力和心理的极限，慢慢度过了劳动关，也得到了老乡们的高度认可。他们不由赞叹，这些学生娃娃真能受苦，咱们自己的娃娃都吃不下这些苦啊！这也多少改变了老乡们重男轻女的思想。他们在给我们评工时，第一次给妇女提高到6分、7分。是队里有史以来的妇女最高分，比村里婆姨女工的分都高。

从那以后，老乡对我们更加关爱。他们看到我们没有菜吃，就轮流给我们送来他们自家腌好的咸菜。他们将红、白萝卜丝和圆白菜丝腌在一起，酸酸的，鲜亮亮的，真好吃啊！至今我都记忆犹新。

离开延安后，我先后在工厂、银行、大学等单位工作。我从学徒工做起，之后做过车间统计员、办公室秘书、组织干事等。工作岗位多次变换，结婚后与爱人两地分居多年，带着孩子读书上学。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坎坷，从未退缩过。因为那么艰苦的延安岁月我都熬过来了，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克服的？同事们都说我心态好，总是那么乐观。我想，这也许是延安生活赠予我的财富吧。